

十九世纪中期西方来华游记的变化 ——以福琼《两访中国茶乡》为例

敖雪岗^①

[摘要]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西人来华游记,与此前西人游记有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表现在游记资料来源的不同,观察、记录方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其实都与游者关心内容与关心焦点的变化有关,也与他们需要些什么有关。这种变化开了后来西人游记的先河,很值得关注。英国植物学家福琼的游记《两访中国茶乡》是其中的典型。

[关键词] 西人来华;十九世纪中期;游记;变化;福琼

The Changes of the Travels of the Western Adventurers to China in Mid-19th Century —Focused on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by Robert Fortune Ao Xuegang

[Abstract]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travels of the western adventurers in China have changed significantly. These changes include those of information sources, observation methods, writing methods, etc. All these changes are relevant to the changes of the Westerners perspectives and focuses on China, and also relate to what they want from China. These changes open the door for the later travels of western adventurers. Among these travels of mid-19th century, *Two Visits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 by Robert Fortune is a typical one.

[Key words] western adventurer; mid-19th century; visits; change; Robert Fortune

十三世纪末,马可波罗在热那亚的监狱中口述了他的中国游记。在游记中,马可波罗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良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

^① 作者简介:敖雪岗,南京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

多力克等人的书信游记,他们众口一词,宣称中国城市的宏大和繁华,这些描述最终使欧洲相信这个人口众多而又壮观的中国确实存在(赫德逊 2004:125)。

在此之后,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纷纷踏上东游的道路,并留下他们的游记书信

和游记。这些游记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

政治和桥梁。十六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中期,更多耶稣会教士们来到中国,在他们写在国内的

游记中,不仅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政治和桥梁,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农业、

繁荣,农耕技术的发达,官僚体系、法制系统,等等。耶稣会教士们的这些记述后来集中收录在杜赫德于 1734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一书中,从而在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赫德逊

政治、法律都很感兴趣,希望引进中国模式来改良当时的欧洲社会。“当时的法国却兴起了一个学派,它在这个体系(指中国的政治体系)看到了政治完美的模型,提议要在欧洲移植中国

波维尔甚至在 1769 年写道:“只要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可能

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初的西方游客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他们带着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向往和憧憬,希望看到他们在前人游记中看到的那些为中国赢得赞誉的文明场景。可是他们看到的却让自己大失所望,于是批评起来也就不遗余力,并逐渐形成了质疑中国、贬低中国文明成就的潮流。如果说 1600 年利玛窦的传教团开始了这股潮

命的深入进展和完成,这股潮流愈演愈烈,而鸦片战争前后,正是这股潮流逐渐成形的时

这一阶段的西人来华游记,与此前西人游记有了明显不同,同时又开了后来西人游记的先

河,很值得关注,英国植物学家福琼的游记《两访中国茶乡》是其中的典型。

作为一名植物学家,福琼先是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的派遣,来到中国从事植物采集,将大量中国植物资源运送至英国。1848 年,福琼又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深入中国内陆茶乡,将中国茶树品种与制茶工艺引进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茶园,结束了中国茶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从这一点上说,福琼的中国之行很值得关注。福琼把此行记录下来,写成一本游记《两访中国茶乡》。这本游记与此前西人来华游记有很多不同,福琼是名科学家,又肩负特殊使命,他对中国的观察、对中国的认识也因此和此前外国人不太一样,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在某些方面开了后来西人游记的先河。

① 此书后被译为英文,英文书名《伟大强盛的中华帝国史及其情况以及巨大的财富、宏伟的城市、政府和杰出的发明》,可见此书的主要内容。

下文便以福琼这本游记为例分析这些变化有哪此特点,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变化

大反讹。如果说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论叙,主要得自耳闻,那么十九世纪之后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靠目见。

耳闻的东西有不少是对中国的美化,甚至还有一定的猎奇性。其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得自其他西方人的介绍。十九世纪前,西方作者对中国情况的介绍,有不少是得自传教士。

以《中华图说》和《中华图说续编》为例,这两个书作者均为传教士,其作者同多靠和补赫德都没有去过中国,前者在墨西哥乘坐他人传其,后者是乘德可斯主教的书信,辗转因循,有些内容不乏猎奇性。而十九世纪以后,西方人所写的中国游记,其资料来源则是作者本人在华所见所闻,其资料来源和叙述态度都大不相同。

这些十九世纪以后的作者,他们或亲临其境,或信或心都还给了他们在这地立可新一些介绍,但对于这些介绍,十九世纪后的游者们大都带着怀疑和猎奇的心态,耳闻与目见一起联想,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在亲身经历后集成的叙述。正如福琼在笔记上,取埃德士的记述

地时记录他那时看到的情形与当时的心态那样,他看到陆地上灌木低矮,一片荒芜,他问道:难道这片土地就是我在英国常听说的“花园”?一个遍布茶花、杜鹃花与玫瑰花的国度?(福

琼 1915, 354)杜赫德对五圭溪的夸饰之词:“这和高峻者直上冲,设计开凿出一条条栈道,通往那些供奉神佛的庙宇,然时这些彩球,寺宇以及所有教堂那些刻刻容的瓷工其部都被取到直立来了。游人顺着小径进到溪谷中来,溪谷两侧就是这些傲立的悬崖。观光的带人们仰望看越上越高的庙宇庙宇的庙宇,他们必定认为,在这样上流得不的地上,建设这些庙宇比上就

赫德笔下的马车,如果有的话,它们也一定是因为某个专门的目的而来,或者来自了某个遥远的地方,因为这个地区没人使用马车。至于彩船,在河里倒是很常见,如果它们能驶进到这里来,那这里也就不会有这么神奇了。”(福琼 2015, 354)杜赫德没有亲自到过武夷山,也

呢吧,在交通条件恶劣的九面溪,亲自看到彩船和轿车的可能性确实非常低。正是类似的不实记录引起了十九世纪以后游者们(如福琼)的警惕甚至反感。

杜赫德曾在书中介绍中国公路、桥梁系统的完善,这也是十九世纪以前很多西方来华游记中才有的词汇。一直认为杜赫德叙述其内容的可信,但大面对华之前,杜赫德对中国的叙述总是带有一定的猎奇性,像他的描述,过高的评价公路和桥梁的完善,以及“中国自造公路”(杜赫德 2004, 205)福琼虽然读过这些材料,所以才会在自己的游记中反复对比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公路和桥梁的成就。比如上述关于修建道路和桥梁,“修建这些只有寥寥几条几条乡下的道路也有不于道路之路,则。道路上的任何都已何深且,且度且,且有这些

多,技术发明众多,政府管理良好的国家。如果说英国给乾隆祝寿的代表团开始了这股潮

介(如过去有关中国的游记和翻译到西方的中国经典)来了解中国,而是希望通过亲眼看见的东西来重构一个异国,包括这个异国的文化以及它的自然特点等。

以中国农业为例,在以往有关中国的介绍中,中国农业的高水平一直是个重要的内容。对此,福琼更愿意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自己对中国农业水平的判断,而不是盲从以前的西方作家。他写道:“然而,在谈到中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这一话题时,很多作者的文章都有过分夸张之嫌。一方面,中国政府对外国游客总是充满了戒心,所以有能力说清楚农业技术的外国人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于是只好发挥他们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另一方面,那些有机会进入并生活在中国内地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们,对于农业技术,他们显然所知不多,对别的国家在农业技术上的进步更是如此。……我们头脑中关于中国农业的很多错误认识都来自于这些从前的作家们,特别是那些只知道辗转抄摹的作家们的描述。”(福琼 2015:151-

几乎都会提到梯田,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它们要么被作者过分夸大,要么就被过分贬低。”(福琼 2015:158)福琼对这些道听途说、辗转抄摹的材料的不满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更想通过自己的观察来对中国农业的水平高下做出判断,“我在中国游历了将近三年,我将详细介绍三年期间观察到的有关中国农业的情况,以便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在这三年当中,从中国南方到北方,我有很多机会观察到不同的种植方式及其收成状况,所有这些都记在我那时的

天的日记中,像平常那些出外旅行的人所写的日记那样,放在平常旅行的人与英国商人相比,后者的船队可以到达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商业活动遍布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福琼 2015:158)福琼以及后来的一些西方游者,他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调查来构建一个异国,这一调查通过直接的接触,以此终结西方人对中国的臆化。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引以为豪的科学精神。

四

除了游记资料的来源和作者了解中国的途径有所变化外,即使是同样源自观察的材料,十九世纪以前和十九世纪以后的游记也存在着“科学”程度上的不同。从十八世纪末期开始,在西方引以为豪的科学精神指引下,科学观察方法和科学记录方法在游记中开始得到广泛使用。

在科学观察方法这一方面,从十八世纪末期以来,西方人开始对汉语及中文人进行类似于人类学的分析。他们运用他们高高在上的调查的分析方法、分类方法,以概念等等来解构

中国社会,分析中国人的特性。十五世纪以来,西方人头脑中有关中国的知识已经大大增长了,这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对古希腊罗马的崇拜,以及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东方的崇拜,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西方人把世界的其他部分看作手术台上的病人,或者实验室里的动植物标本,用显微镜或手术刀对它们进行观察和分析。这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在游记中的一种反映。

这种科学观察方法体现在游记中,便是游记的写作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往的游记多偏重对异域风情的描绘,不是对异域守备,就是对异域探险。但从十八世纪末叶开始,游记开始变得平实起来,通过平实的语言、准确的数据、对科学观测仪器的使用、引用日历、详细标注的途径、对地标性建筑的反复强调、精确的测量等,对所观察到的某一事物或现象进行“科学”的描绘。

作为一名身负特殊任务的传教士,福琼的游记在这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福琼的游记中,他记载了很多数字,诸如里程、海拔、气压、新作物种类、磅数、大数数字等,都有非常详细的量化记录与定量分析。如他对中国茶叶价格的分析,分析中国茶叶商人所获得的利润:“约台,为你们在印度一下位型位型之茶的百分。1840年,20月,英商在印度出口茶的总产量为,英商在印度每年输入茶三,这些茶在三地都售就是,1840年每磅售 12 两银子,1847 年为每磅 12 两银子,1848 年为 9 两 10 两银子,1849 年为 7 两 2 两银子,这些茶叶在印度都括了出口税。”(福琼 2015:267)

为了进行科学统计和分析,游记还绘制了许多图表,以期让读者得到一个一目了然的印象。以福琼对英商在印度出口茶为例,他制作了四个表格,包括茶叶在各地到各出口码头的里程表,每箱茶叶的运费表格,各出口码头的茶叶成本价表格等。(福琼 2015:367-369)此外,为了准确科学直观,福琼还请人画了三十幅左右的插图,力争真实形象地再现中国。福琼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些手段(记叙)安排,来使人相信他对中国的描述更真实,也更科学。

在通过所谓科学分析、科学记录之后,他们给中国人贴上一个标签,就像是在实验里给某种物品作出鉴定一样,“啊,中国人就是这样,这就是他们的办事方式”。这样的记叙方式在福琼的游记中屡见不鲜。

五

资料来源的不同,观察方式、记录方式的变化,这些其实都与游者关心的内容与关心焦点的变化有关,也与他们需要此什么有关。这种变化在十五世纪前后的游记中体现得很

中国士人阶层接触。在这个时期,那些没来过中国的西方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中国的情况与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状况联系起来,或相比照,而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怎样利用中国获

革的范例和根据。他们崇拜中国的理由实际上非常简单。他们所以引征亚洲,是因为欧洲

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他们的依据。欧洲的全部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他们所不喜欢的

政治倾向的影响……但是在远东有一个与罗马同样古老的帝国,现在依然存在,人口和整个欧洲一样多,没有世袭贵族及教会的特权,由天赐的皇权通过学者—官吏的官僚机构来统治。这里的模式适合于新君主主义者,是一个可以引用的范例。”(赫德逊 2004:268)赫德逊分析道:启蒙主义者、新君主主义者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印证自己的理想,这个东西在欧洲找不到,而在远东找到了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十九世纪以后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虽然传教士仍然占主体部分,但也有很多世俗之人。他们或者为了经商,或者为了外交,带着各种实用的目的来到中国。这些人更关心中国的世俗生活,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了解中国人的真实特点和行为习惯,如此才可能让其在

宫廷中各种天子符咒,如果押张御图杀,夕理理乙个中的柳例图杀就是因此而吸收进去的。这是十九世纪后游者对皇权崇拜的具象崇拜中皇权崇拜,他们崇拜皇权是崇拜皇权的背后。就如福琼第一次来沪上海,住在上海的中区租界,他住在法租界,后来在安徽又住卷卷租界,他无法把皇权崇拜带去。

十九世纪后游者对皇权崇拜不再崇拜皇权,十九世纪后的游者更关心白话文

发明的新奇之处,带有强烈的猎奇性质。十九世纪后的游者们则更关注中国本土机器与发明的实用性,对其作详细介绍,或者详细介绍中国在农业、制造业方面机器的缺乏。如福琼

很明显的趋向,西方人对他们新近发展出来的改造世界的科技力量,特别是大机器展现出来的人类改造大自然、统治大自然的力量越来越憧憬。在西方人考察欧美以外的国家的时候,

文明程度的标尺。福琼便是这种趋势的开创者之一。在新安江上,福琼“看到了第一架水碓。

福琼来,所以中国西人既中西也常失物而然在物而,他到以物而,以物而文明又到了区,或者泥,因文明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它的光辉,

侧重点的不同突然现在,十九世纪前的官方游者对中国官僚机构的数量、质量以及个人在官僚权力之外享有的自由等很关注,而十九世纪之后的游者则描述官府、监狱管理的可怕。福琼描述清朝中区政府在处置鸦片走私时措施不善,祸害中区政府、军队的腐败可笑。

例如,十九世纪前的官方游者每每描述运河、仁和中商船的巨大数量,而十九世纪后的游者则常常对运河腐败,重新由里方派的船渡渡渡。五友集集录中进入。正初福琼在杭州时的感想那样,“我们经过上海出口货物,在经过杭州时,官道的地方政府很凭着官道的通商位置,对这些货物百般刁难,他们如厚待船主,向船主索取利息,种种敲诈勒索,非言于商人们的各种抱怨不啻于耳。总有一天,那些有关外国人不能越远范围限制的愚蠢规定全被清除干净,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帝国境内自由地贸易、旅行,就像在别的国家一样,这一天不会离得很远。”(福琼 2015:234)

合。尽管目的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试图从中国社会中发现一些欧洲不尚具有的特点。哪

记和书信中,置身异国的游者试图不再依靠他那由母体文传统

我文化反省的性质,在这些游

了解。而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游者,在西方中心思想已经确立的背景下,他们更关注于中国社会的异域性质与不寻常之处,并对这些与西方不同的东西发出严厉的指责,热情地为他们的文化偏见唱赞歌。他们关心中国的现实情况和经济状况,也是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关心的是中国对西方有何用处,西方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所以这一阶段西方人对中国的叙述,有关中国的游记更可以视为右文主义的基本。即由于作者自身的母文化叙述逻辑

[1] 张在柱:《美国游记》,《美国研究》,1999(4)。